

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冲突

——法国“黄背心运动”背后的税收与福利对决

刘 涛 王滢淇

内容提要:本文聚焦当前法国的焦点事件——“黄背心运动”，分析了该项社会运动的走向和成因。社会抗议和工会运动曾是“黄金时代”推动法国福利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财政紧缩和社会结构变化，福利资源不断收紧，社会分配冲突日益加剧，法式福利国家陷入福利的“永续失衡”，面临重新校准、成本控制和再商品化的改革挑战。与此同时，在欧美反建制主义社会环境中，精英与大众在社会语言及社会结构意义上日益激烈的“福利对决”导致两大群体在增税和减税的“福利战场”反复博弈，民粹主义开始影响社会运动的走向。这一切构成“黄背心运动”重要的社会历史逻辑规律。在各种社会离心力量下，法式福利国家的改革举步维艰，呈现“无向游弋”的特征，重要的社会改革及福利制度改革将有可能在社会冲突的固化结构下再次搁浅。

关键词:法国“黄背心运动” 福利 税收 精英 社会冲突

一 引言

2018年，恰逢法国“五月风暴”50周年，法国民众开展了一场规模和影响力堪比“五月风暴”的“黄背心运动”(Le mouvement des Gilets Jaunes)。该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反精英与反建制，凸显了欧洲民粹主义盛行之下日益尖锐的社会两极分化冲突。法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大众”与“精英”社会对立在互联网时代迅速传播蔓延，“在线”与“离线”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和相互激荡，社会冲突的“火花”经由互联网和新兴社交媒体的传播形成“燎原”之势。作为互联网时代社会运动的代表，“黄背心运动”在虚拟空间的组织动员模式与传统社会运动具有显著差别，抗议的诉求和参与群体也更为多元化和分散化。然而在五光十色的抗议诉求中，依然可以看到一条冲突的主

线:税收与福利存量的跨阶级变动。提高燃油税是本次运动的直接肇因,隐藏在“税收”这条明线背后的是公众和精英对于福利存量调整的拉锯战线——参与运动的普通民众拒绝燃油增税,他们担忧马克龙改革可能导致普通民众福利存量的流失,而富裕阶层则可能借由工商业税收的豁免改革而获得更多的福利存量。此外,本次运动呈现出福利民粹主义倾向,社会大众表达了对自身福利状态的担忧以及对于社会不公平的“愤怒情绪”。他们反对精英领袖及建制派推行的社会改革,甚至反对其对问题的单方定义权和议题设置权。

本文尝试从税收、福利及社会冲突这一主线阐释“黄背心运动”的社会文化成因,并分析法式福利国家的福利走向。

二 西方福利国家理论的审视:福利、税收汲取能力与社会冲突

理解法国社会运动与福利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要寻找西方社会福利国家产生的源头。西方福利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扩张尤其受到两项因素相互交织的影响:一是二战后黄金经济发展周期带来的税收持续增长。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现代国家是一个“税收国家”,一国的税收汲取能力决定国家的基本生存能力,也决定一国建设公共政策的能力。^①从福利国家的角度来看,一国的税收汲取能力是福利国家的基本生存条件,直接决定国家社会投资规模和水平;^②二是社会冲突,体现福利国家发展的社会“动力”或社会“冲力”。彼文与克劳德认为,社会福利的建设就是在社会运动与抗议中统治阶级做出让步与妥协的结果。^③卡斯特勒斯与科彼则认为,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和此起彼伏的罢工成为推动福利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④而奥佛直接将福利政策扩张归结成为大众民主、选举权以及社会运动共同推动的社会合力结果。^⑤如果经济持续扩张带来的税收增加是福利国家扩展的经济要件,那么社会冲突及运动则反映福利国家发展的政治条件。

在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法国的社会政治发展独树一帜。法国属于高烈度

^① R. A. Musgrave, “Schumpeter’s Crisis of the Tax State: An Essay in Fiscal Soci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Vol.2, No.2, 1992, pp.89–113.

^② S. Wang,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e Extractive Capacity,” *Modern China*, Vol.27, No.2, 2001, pp.229–261.

^③ F. F. Piven und R.A.Cloward, *Regulierung der Armut, die Politik der öffentlichen Wohlfahrt*, Suhrkamp, 1977, pp.77–81.

^④ F. G. Castles, *The Social Democratic Image of Society*, Routledge & Kegan Paul, 2009, pp.2–35; W. Korpi,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pp.19–27.

^⑤ C. Offe, “Competitive Party Democracy and the Keynesian Welfare State: Factors of Stability and Disorganization,” *Policy Sciences*, Vol.15, No.3, 1983, pp.225–246.

冲突型社会,崇尚以社会抗议和大规模罢工等激烈的冲突手段来影响社会议题的走向。相比之下,德国、奥地利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在二战后发展了“社会伙伴关系”模式,强调社会冲突各方从国民经济竞争力和国际资本投资稳定的角度进行谈判和协调,避免高烈度的社会冲突。法国的工团主义形塑了社会的抗议文化和斗争思维,而德国的社会伙伴主义则为世界贡献了三边协调及谈判机制。^①然而,无论是社会运动还是社会合作,这些理想类型往往都共存于同一个国家内部,只是哪种机制占据主流的问题。整体而言,社会运动和抗争作为一种社会沟通形式和媒介,在整个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史中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为西方经济增长和福利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画上“休止符”,西方主要国家长期陷入经济“滞胀”。古典黄金时代的辉煌无法重演,同时,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还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人口不断减少、人口出生率跌至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福利国家陷入“永续失衡”的困境,即福利水平随制度惯性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而低迷的经济增长、就业市场和人口出生率却无法创造与高福利时代相兼容的社会经济和人口条件,并且这一多边失衡状态呈现长期结构化趋势。面对福利国家普遍的永续失衡,皮尔逊判断西方福利资本主义的三种类型均面临“再商品化”“成本控制”和“重新校准”三大调整方向。^②在此背景下,福利国家历史上的另一个要件——社会冲突将如何在新历史条件下形塑福利国家的发展?如果说黄金时代的社会冲突是社会政治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其在福利国家的扩展过程中扮演主要“推手”的积极作用,那么在后黄金时代,社会冲突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福利国家的系列改革?当下被反建制主义和民粹主义裹挟的欧美国家,社会冲突将呈现何种新形态?法国“黄背心运动”将为我们探究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的观察维度和研究视角。

三 法国社会运动新剧目:“黄背心运动”

查尔斯·蒂利将抗争表演的一般形式总结为社会运动剧目。通常,运动剧目包括特定协会和同盟的组建(社会运动基础)、社会运动活动(包括游行、示威、公开请愿和游说等行动)以及公开的自我表现(通过象征性的服饰、徽章、整齐队列、口号等形式

^① 参见考夫曼对德国和法国福利国家及其他西方福利国家的比较, F. X. Kaufmann, *Varia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Great Britain, Sweden, France and Germany 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Springer, 2013, pp.23-239。

^② P. Pierson,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76-329。

表现运动参与者的团结和奉献精神)。^①从表现形式来看,“黄背心运动”符合蒂利运动剧目理论的要素,但由于互联网对运动的广泛渗透,“黄背心运动”又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剧目的新特点。

“黄背心运动”最早追溯至2018年5月法国一名女性在某社会公益请愿网站(change.org)上发起的要求政府降低汽油价格的请愿书。10月中旬,该请愿获得30多万人的签名(一个月后接近百万)。同时,两名卡车司机在“脸书”(Facebook)上发起“封锁道路”活动,抗议燃油价格上涨,并将身着车载黄色背心参与抗议的想法广泛传播。互联网是“黄背心运动”进行社会动员和组织的主要工具。据统计,63%的法国人使用社交软件“脸书”,而“脸书”每天平均捕获每位用户53分钟的注意力,在受众数量、活跃度和关注度上远超传统媒体。此外,基于社交网络的新算法,网站对新闻的推送基于客户浏览记录和关注的群组。这一方面有助于“黄背心”寻找自己的组织,另一方面也因为新算法的过滤功能,关注“黄背心”的人群所获取的信息更加“黄化”。在“脸书”上,个人自发制作的“黄背心运动”相关视频达600万个,单个视频浏览量最高达400万次,标签为“黄色背心”的小组数量已增加到370多个,其中关注度最高的小组关注度高达200万人。^②

随着病毒式传播视频的广泛扩散,以及“黄背心”相关网络标签和小组的井喷式增长,经由互联网的串联,“黄背心运动”的剧目发生创新——互联网替代工会和协会等传统组织的动员功能,同时,通过网络小组和即时通信在虚拟空间建构组织,形成新样态的社会网络。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黄背心运动”更新了“运动剧目”理论关于特定组织建立的定义。但除此之外,“黄背心运动”的其他特征仍然契合传统的运动剧目理论:(1)组织社会运动活动。11月17日线下抗议活动首次走上法国街头,仅17日当天,法国多地就爆发了2000多场以阻断交通为主要手段的抗议活动,此后的每个周六,“黄背心”在法国多地组织规模不等的抗议活动。(2)公开的自我表现。通过身着鲜明而统一的黄色背心表达团结的信念;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传播诉求与运动动态,寻找更多支持者;抵抗政府的镇压,进行夸耀式的牺牲行动以表达献身精神。^③从运动对社会效应的影响来看,“黄背心运动”混入民粹主义和极端分子,抗议过程出现不同程度的暴力和破坏活动。根据法国内政部公布的数字,截至2019年5月,全法派出警力近十万人,导致约2500余名参与者和1797名警察受伤,5000余人被捕,1000

^① [美]查尔斯·蒂利、[美]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② L. Bianchi, 《Chi sono i 'gilet gialli', la versione francese dei Forconi》, <https://www.vice.com/it/article/wj3n9b/chi-sono-gilet-gialli-movimento-protesta-francia>, last accessed on 10 February 2019.

^③ Ibid.

余人被判刑,10人死亡。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表示,此次运动导致法国201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降低0.2个百分点。^①

“黄背心运动”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18年11月至12月初,运动进入高潮。这一阶段每周抗议人数为7-30万不等,规模较大。抗议目标主要是抵制政府上调燃油税。为防止运动继续扩大,12月5日,法国总理菲利普宣布暂时取消燃油税改革计划,但抗议活动并未停止,运动诉求扩大到降低所有税收、提高最低工资和养老金、反对马克龙政府及其系列改革等。此外,更多法国人通过互联网小组和线下活动加入进来,声势愈发壮大。79%的受访民众表示同情、支持“黄背心们”。此时,运动双方中,“黄背心”一方占据有利地位,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

第二阶段,2018年12月末至2019年2月,抗议民众与政府双方逐力。12月10日,马克龙总统发表三次全国讲话,发放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加班工资免税、对最低收入退休者减免税收等福利包,希望抑制运动局势。但“黄背心运动”在新年过后仍在继续,且人数有所回升,为5万至8万不等。1月15日,马克龙宣布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国民大辩论。2月5日,“黄背心运动”首次与工会合作,共同举行全国性的总罢工及游行。这一阶段,双方僵持,马克龙政府虽做出妥协,但在改革问题上态度坚定,“黄背心们”则寻求工会和政党的合作,坚决抵制改革。

第三阶段,2019年3月至今,运动进入尾声。3月15日,国民大辩论结束。次日,全法仍有3.2万“黄背心”组织抗议,政府谴责其暴力活动,并禁止在部分街区游行。4月15日,巴黎圣母院火灾获得捐款引发“黄背心”不满,2.8万“黄背心”再次走上街头。4月25日,马克龙就国民大辩论进行总结;5月,马克龙宣布将恢复改革议程。截至2019年8月,运动还在继续,但运动规模和参与人数日渐式微,同时由于“黄背心”诉求的盲目性及其组织暴力活动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伤害,“黄背心运动”的支持率逐渐回落。2019年2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56%的人希望“黄背心运动”结束,三分之二的人认为“黄背心运动”已偏离该组织的最初诉求,^②这与运动初期79%的民调支持率形成鲜明对比。

“黄背心运动”在行动首日集结约30万人,运动初期的参与者主要来自中下阶层,生活在远离城市的中小城镇或农村,被隔绝在公共交通和其他公共服务之外,燃油

^① A. Mazoue, “Yellow Vests, Six Months on; Unprecedented fury, Uncertain Future,”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90520-france-yellow-vest-protests-six-months-uncertain-future-european-elections-macron>, last accessed on 10 February 2019.

^② P. Davies, “‘Yellow vests’: A Majority of French People Want ‘gilets jaunes’ Protests to End; Poll,” <https://www.euronews.com/2019/02/14/majority-of-french-people-want-gilets-jaunes-protests-to-end-poll>, last accessed on 21 June 2019.

税上涨首先影响他们的生活,这场运动也因此被认为是边缘人士的抗议。相较 1995 年朱佩劳动法改革首日 200 万人罢工抗议的场面,“黄背心运动”的规模并不凸显。它被称为“新社会运动”,主要是因为数千个分散在法国全境的零散组织自动动员,离散的诉求和工会的缺位使运动难以被归类,也更难进行社会对话,政府因之产生对“失序”的恐惧。

满载民怨和民愿的“黄背心运动”搭乘社交网络的东风,表现出社会运动的新特点:其一,反对代议制,主张直接民主。“黄背心运动”始于互联网,它取代传统工会的组织动员功能,参与者经由“脸书”和“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介了解“黄背心运动”,在自发制作的视频和图片中获得情感共鸣,借助病毒式传播方式获得迅速传播、动员,并通过社交网络的组群找到志同道合者,最终通过网络实现自我动员、自我组织。运动不依附政党,参与者没有统一的政治立场,极左翼、极右翼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是“黄背心”成员,后期通过“脸书”选出与政府对话的八位代表在此前唯一的共同联系是对汽车拉力赛的共同爱好。“黄背心”拒绝一切形式的政治僭越,多次在社交页面上宣称他们与政党、工会无关,尽管工会和政党都主动声援该运动。基于这种脱离工会、政党的自发性,“黄背心运动”组织的抗议活动多为分散、小规模、多地点同时响应的游行活动,这与传统的工会运动和政党运动有着根本性不同。如历史学家热拉尔·诺瓦里埃尔(G rard Noiriel)所言,与马克龙不依附政党而当选相似,政党与工会的时代仅对应一段有限的、依靠书面媒介实现远距离通信的年代,如今的选民很难忠诚于某一个政党,社会运动往往由某一具体的时局或时事引发。^①

尽管如此,互联网生成的社会网络是分散的弱关系,互联网在实现社会运动的动员功能后,如何维持该运动将是新的挑战。^②“黄背心运动”进行到第四个月时,与法国总工会合作举行示威活动。^③因为诞生于互联网的“黄背心运动”毕竟只取代了工会组织的动员组织功能,主张直接民主的“黄背心们”似乎还在保持个体地位和建立新的领导机制之间徘徊。此外,“黄背心”正在政治化。他们宣布将组建一支 79 人的独立竞选团队,参加 2019 年 5 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并在 1 月公布首批 10 人名单,候选人包括公务员、司机和家庭主妇,拒绝被政党化的“黄背心”已建立自己的竞选团队

^① G. Noiriel, 《Les 'giletsjaunes' replacent la question sociale au centre du jeu politique》, https://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18/11/27/gerard-noiriel-les-gilets-jaunes-replacent-la-question-sociale-au-centre-du-jeu-politique_5389042_3232.html, last accessed on 14 March 2019.

^② D. Mario, “Social Movement Networks Virtual and Re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3, No. 3, 2010, pp.386-401.

^③ “France’s Yellow Vest Protesters Join Union March for the First Time,”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90205-france-yellow-vest-protesters-join-union-march-cgt-paris-demonstration>, last accessed on 14 March 2019.

“公民倡议联盟”(RIC)。自发的社会运动往往由于缺乏领导和成熟的运动纲领,容易偏离最初的运动目标,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行为。原本抗拒工会和政党的“黄背心运动”选择与工会携手并创建新政党,是社会偶然性的发展抑或是此类运动的必然走向,有待时间的检验。

其二,社群多中心主义。互联网打破地理空间的界限,创造了一个虚拟的新公共领域。在这一社会空间中,现实里被隐蔽的公共话语权得到释放,也刺激了直接行动的政治能见度飙升。然而,由于运动经由互联网爆发和扩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者,在“脸书”的活跃分子中选出的八位代表无法经受合法性和代表性的质疑,难以获得民众的认可。在“黄背心们”表面相同的颜色下,是各自对现状和国家不同的诉求。这种多元诉求以往被地理空间局限,难以产生大规模集体行动,但这一界限被互联网打破,在国家范围内形成社群的多中心主义。它通常表现为一种弥散的社会秩序,由于社会共识难以达成,社会整合将越来越困难。在社会多中心主义条件下,社会政策和福利政策的未来走向也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国家的政策制度安排也可能在各种相互矛盾之诉求中不断激荡摇摆。

在“黄背心运动”愈演愈烈的绝望中,为释放民众愤怒,2019年1月15日,马克龙开创性地推出持续两个月的国民大辩论(*grand débat national*),并在社交网络上发表《告国民书》,在全国范围内邀请民众讨论“税务和公共开支”“国家机制和国有企业”“生态转型”以及“民主和公民资格”四个主题。在马克龙每周坚持参加7小时全国大辩论的背景下,其民意支持逐渐企稳。根据最新民调,马克龙的支持率已经从2018年年底最低谷的23%回升至32%。^① 马克龙对国民大辩论所做的总结性回应包括:(1)减税。个人所得税进一步降低50亿欧元,但公民应增加工作量;(2)公务员制度改革。取消高级公务员高薪待遇,^②精简中央政府机构;(3)增加退休者福利。自2020年起,收入低于2000欧元的退休者,退休金随通货膨胀率上涨同步提高,从2021年开始,目标人群扩大至所有退休人员;(4)保障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承诺未经市长同意,不得关闭医院和学校;(5)改革公投,将现有的共同倡议公投门槛降低至100万人。^③

尽管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呈现出多元弥散及失序的特征,但若以果溯因,从马克龙对国民大辩论之回应追溯“黄背心运动”成因,可以肯定的是,本次抗议风暴的中心眼

^① “The Popularity of Macron and Philippe Slightly Increased to 32%,” <https://www.tellerreport.com/news/2019-07-21---the-popularity-of-macron-and-philippe-slightly-increased-to-32%25-.rkWscz3Wfr.html>, last accessed on 1 August 2019.

^② 主要针对公务员中最有权力的高薪群体(“*grand corp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③ “Key Points of Macron’s Plans after ‘Great National Debate’,”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90426-france-macron-speech-response-yellow-vest-protests-taxes-national-debate>, last accessed on 1 May 2019.

即是税收和公共福利。马克龙对国民大辩论所作回应是基于对两个月间全国各地辩论结果和提案的调研分析。在如此浩大工程之后,马克龙开出的主要药方仍是降低居民税收和增加公共支出、公共福利。由此观之,“黄背心运动”与法国后黄金时代社会运动的特点类似,福利抗议是后者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普通民众对税收和福利调整等可能带来的福利存量下降最为敏感。同时,互联网时代放大了法国深厚的抗争文化,线上线下的民意一经调动即成倍数放大。这是本次运动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重要原因。此外,反建制主义的抗议延续法国社会大众对抗精英的传统,精英阶层被认为掌握福利分配权力和主流的话语权,而民众的呼声难以穿透主流声量构筑的“铁幕”,网络自媒体的存在使大众得以在线上表达愤怒,并迅速演变为线下的街头运动。

四 后黄金时代的福利抗议与改革困境

法国的社会运动文化在欧洲独树一帜,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经历 18 世纪末和整个 19 世纪的历次革命被不断强化,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抗争精神已融入法国人的基因;另一方面是法国对无政府工团主义(Syndicalisme)的推崇,使得法国未能建立广泛的劳资谈判机制,社会进步很少通过协商谈判获得,更多的是依靠激烈的社会冲突和直接行动,其逻辑正如达伦多夫所述:“社会契约是由于社会的冲突而重新改写的,社会冲突提供了改写部分的条文内容和改写的力量”。^① 法国是众多解构主义大师的故乡,法国民众的抗议精神可从福柯等人的作品找到答案。福柯认为,现代化塑造规训社会,权力无处不在,民众需要反抗以逃避、摆脱权力的监狱。布迪厄等学者则直接走入罢工者中发表公开演讲,以示对抗议活动的支持。法国社会运动的传统导致高昂的社会成本,但不可忽视的是,是法兰西最先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到世界,而大部分法国人以此为傲。关于当下法国人对社会运动的看法,以下数据可做部分说明。萨科齐曾提出一个清算 1968 年“五月风暴”带给法国社会遗毒的清单,然而 2008 年的一项民调显示:78%的法国成年人、90%的年轻人认为“五月风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在“同样性质的运动会今天再次发生”的选项中,62%的法国人认为会发生;58%的工人和 53%的职员则表示希望再次发生。^②

在拥有深厚社会运动传统的法国,针对福利制度的抗议活动尤为突出,几乎每一

^① [英]拉尔夫·达伦多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8 页。

^② 郑秉文:《法国“碎片化”福利制度路径依赖:历史文化与无奈选择——2007 年 11 月法国大罢工札记》,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9128.html>, 2019 年 3 月 1 日访问。

次针对福利制度的调整都在法国引起规模不等的罢工(见表1)。仅2008年上半年,巴黎因福利引发的罢工就超过30次。^①战后法国的历次大规模罢工促生了许多新的福利及权益,如35小时工作制、3周带薪休假制度和职工长期培训的权利等。而在后黄金时代,围绕福利的抗议活动更多是为了抵抗福利制度的紧缩,维护既存的福利。在“再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形下,撒切尔夫人通过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方案打破福利国家格局,英国借此走出经济困境。这激励了法国几任总统意图效仿,萨科齐和奥朗德还因此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撒切尔”式领袖若要在法国取得胜利,需更多应对民众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热情。特有的社会运动文化使法国对福利制度进行成本控制和重新校准格外艰难。自1990年代以来,法国的历次福利改革均受到群众抗议运动的影响,改革进程不得不放缓甚至多半流产。

表1 当代法国因福利调整引发的社会运动一览表(部分)

时间	内容	持续时间	规模	结果
1995年	反对朱佩“特殊保险制度”改革	1个月	200万人	撤销改革计划;总理朱佩辞职
2003年	反对拉法兰退休制度改革	2个多月	/	改革法案通过;总理拉法兰提前下台
2006年	反对“首次雇佣合同”法案	3个月	300万人	废除《首次雇佣合同法》,重新修订旨在帮助年轻人就业的新法案
2010年	反对萨科齐“新退休制度法案”	从2008年宣布改革之日起抗议不断	300万人	运动失败,政府强行通过改革法案
2016年	反对奥朗德劳动法改革	3个月	100万人	奥朗德被迫使用宪法第49.3条款强行通过劳动法改革;奥朗德放弃2017年大选,在大选前的民调支持率仅有8%

注:表由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黄背心运动”虽因抗议燃油税上涨而起,但本质却与后黄金时代针对福利的抗

^① 张丽、姜芑:《法国近百年来的社会运动与社会保障制度》,载《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第67-75页。

议活动相同。在政府同意取消上调燃油税后,民众最终的诉求又回到以提升购买力为核心的税收和福利水平两大主题上。这背后存在两组矛盾。一是福利制度永续失衡的困境:经济增长停滞和民众对福利需求继续高涨之矛盾;国家福利供给能力下降和高昂税收体系无以复加之矛盾。二是大众和精英剑拔弩张的福利对决:关乎小民生计的燃油价格和精英环保理念之争;普通民众要求降低一切税收却要求对富人开征“巨富税”的税收之争。一端是无可避免的永久性紧缩,另一端是激烈的社会冲突,二者形成一副枷锁扼住法国福利改革的方向,继而形成失序的福利体制。与此同时,失序的福利体制再次强化民间的社会冲突,并成为法国后现代社会运动的主要成因。下文主要探讨法国福利体制改革困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后工业化时代福利国家的普遍危机

19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制度遭遇深刻的危机。大众舆论认为,危机的根源来自全球化。因为全球化削弱民族国家处理各国事务的能力,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的竞争又使发达工业国家失去制造业市场以及就业市场。皮尔逊则质疑用全球化来解释福利国家危机的说服力。他承认福利制度面临预算紧缩压力,但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发达工业国家内部受到的后工业化变化:后工业化导致经济增长减缓,国家预算能力下降;福利制度进入成熟期,政府承诺不断扩张,最后达到极限,但兑现吃力;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调整、失业率攀升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和福利需求。^① 面对后工业主义的挑战,福利国家的福利供给能力普遍收紧,各国都着手调整福利制度。以英国和新西兰为代表的国家实施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方案,福利制度的私有化和商品化程度随之上升。

相反,一直到1990年代,法国依然维持高给付水平的高福利制度。因此,虽然富裕民主国家普遍面对后工业化时代的福利制度危机,但法国的危机相对更为严重。皮尔逊评价法国的福利体制是最难以撼动的(immovable),^② 法国人高度依赖社会保障体系。1980年开展的种种民调均显示,80%的法国人认为拆解社会保障(la Sécurité sociale)是极具破坏性的。^③ 二战后法国走上大规模国有化道路,对国家财富的不断社会化一方面成就了法国最为慷慨的福利制度,但同时给国家带来不能承受之重。法国是欧洲大陆法团主义福利国家的代表,其福利制度是为了维持居民收入,而

^① 张丽、姜芑:《法国近百年来的社会运动与社会保障制度》,第120-123页。

^② P. Pierson, “Irresistible Forces, Immovable Objects: Post-industrial Welfare State Confront Permanent Austerit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5, No.4, 1998, p.558.

^③ B. Palier, “‘Defrosting’ the French Welfare Stat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23, No.2, 2000, p.117.

非纯粹缓解贫困(自由福利制度)或普遍性再分配(社会民主制度)。^① 进入 90 年代后,法国国民经济总量的近三分之一用于福利支出。2016 年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的 34.34%,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位列第一,且福利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在不断增长。如果把福利开支从 GDP 的五分之一提高到三分之一,将深刻影响分配关系、利益格局以及既有的社会团体间的关系。2016 年,法国用于医疗、家庭福利和失业津贴等领域的支出约为 7150 亿欧元。但法国人为此承担 OECD 国家中最高税负。2017 年,法国税收收入占 GDP 的 46.2%。^② 此外,人们对社会保障更高的需求、老龄化和高失业率带来的社会抚养比上升等导致法国社会保障支出稳步增长。进入 21 世纪后,法国僵化的雇佣体制和高昂的用人成本使失业问题在欧洲国家中更为突出,失业率常年维持在 8-10%,紧随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之后,两倍于其邻国德国。^③ 高失业率和老龄化等问题进一步减少了福利供给的财政(税收)资源,同时产生更多社会福利的依赖者。而同期法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常年维持在 1-2%,与欧盟平均水平持平。2008 年,在全球金融危机打击下,法国经济甚至出现负增长。1960-1993 年,法国社会保障补助金年增速均高于 GDP 的增速,最高时相差 10 倍。^④ 2018 年,法国社会保障收支的赤字达 107 亿欧元,而这已是 2003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表 2 列出部分 OECD 国家近年经济和社会领域相关数据,国家间的横向比较暴露了法国社会福利体制的脆弱性。法国经济增长率在 OECD 国家中居末位,政府存量债务却高居首位,2017 年占 GDP 的 98.4%;财政收入不敷出,社会保障开支占 GDP 比重却高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2018 年失业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大部分 OECD 国家,仅次于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未在表中列出);为了以有限的财政资源维持到达极限的政府承诺,法国的实际税率也居于首位。威伦斯基(Harold L. Wilensky)用“痛苦可见的税收”(Painfully visible taxes)来形容税收和福利支出巨大且严重依赖收入和财产税的福利国家。在这些国家,社会抗争会更普遍。^⑤

法国的福利极为慷慨,但社会福利的供给受制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福利永

① B. Palier, “‘Defrosting’ the French Welfare State,” p.116.

② “Revenue Statistics 2018-France,” <https://www.oecd.org/tax/tax-policy/revenue-statistics-2522770x.htm>, last accessed on 11 June 2019.

③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tgm/table.do?tab=table&init=1&language=en&pcode=tps00203&plugin=1>, last accessed on 8 March 2019.

④ 1960-1993 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法国社会保障补助金增速均高于 GDP 增速,特别是 1990-1993 年间,社会保障补助金增长率为 3.8%,同期 GDP 增速为 0.3%。数据来源于《Les Comptes de la Protection Sociale, Rapport sur les Comptes de la Nation, juin 1994》, <https://drees.solidarites-sante.gouv.fr/IMG/pdf/cps2008.pdf>, 2019 年 6 月 11 日访问。

⑤ H.L.Wilensky, *Rich Democracies: Political Economy, Publ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241.

续失衡的背景下,国家需要对各种福利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而法国的困境在于,它既是最需要改革的国家,也是最难实施改革的国家。政府迫切希望改革福利体系,但又忌惮选民的反抗和政治的不稳定;工会和民众希望通过改革获得经济增长,但他们对可能产生的既得福利损失反应更强。事实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政府已无法回避紧缩问题,因而采取了一系列福利调整措施,如巴拉迪尔(1993 年)的私人部门福利调整、朱佩(1995 年)的“特殊退休制度”改革、拉法兰(2003 年)的公共部门养老金改革以及菲永(2007 年)的国营工人养老金改革等。在福利调整问题上,左右翼政党已经抛开政见站在同一立场。但改革的结果往往被社会抗议左右,政府大多妥协。因此,有学者认为,法国近代以来的福利调整多是边缘性的(marginal),或者仅限于成本控制,没有进行重大的结构重组,单纯的福利削减背后仍然保留了与传统福利体制同样的逻辑。

表 2 欧盟部分国家近年 GDP 增速、社保支出占比、政府债务、失业率、实际税率比较

	2016 年 GDP 增速	2016 年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比重	2018 年政府存量债务占 GDP 比重	2018 年失业率	2018 年实际税率
瑞典	2.29%	29.62%	38.8%	6.20%	47.40%
芬兰	2.63%	31.85%	58.9%	7.60%	46.44%
丹麦	2.24%	31.10%	34.1%	5.00%	41.35%
法国	1.82%	34.34%	98.4%	9.20%	56.73%
德国	2.22%	29.40%	60.9%	3.40%	52.12%
奥地利	3.04%	30.03%	73.8%	4.90%	54.32%
荷兰	2.19%	29.52%	52.4%	3.88%	47.04%
英国	1.79%	26.19%	86.8%	4.00%	35.08%
爱尔兰	7.80%	15.83%	64.8%	5.90%	31.55%

注:表中数据为作者根据 Eurostat、Ceicdata、Databank、“The Tax Burden of Typical Workers in the EU 28—2018”来源数据计算得出,其中失业率为 2018 年 7 月数据(经过季节性调整),实际税率=(社会保障缴费+所得税+增值税)/实际工资总额。

(二)福利角逐:增税还是减税?

正如法国左翼领导人梅朗雄所言,当老百姓对税收进行抵抗时,在法国通常意味着革命的开始。早在18世纪,法国人就曾因反对路易十四给第三等级加税而走上街头。本次“黄背心运动”中,围绕“增税”和“减税”的两种抗议声音格外突出。一方面,这体现了法国人抵抗税收的传统,另一方面,更是大众和精英的福利角逐。

抗议的首要目标是反对政府加征燃油税。法国政府决定自2019年1月起,对柴油和汽油分别征收6.5欧分/升、2.9欧分/升的燃油直接税。当前法国柴油和汽油价格为1.47欧元/升、1.36欧元/升,^①在欧洲国家中分别排名第六和第四。根据法国生态转型与团结部的规划,预计2022年马克龙第一个任期结束时,法国柴油、汽油价格将超过2欧元,成为燃油价格最高的欧盟国家。按照TICPE的测算,增收的燃油税将在2019年为法国政府带来78亿欧元的财政收入,这笔收入将被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低收入阶层对燃油价格变动最为敏感,在法国尤为如此。法国人口密度低,平均每平方公里居住103人,而相邻的德国为232人,这意味着很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小城镇。这些地区仅被少量公共交通覆盖,汽车是他们往来的主要交通工具。相反,中上层人士主要居住在市中心,出行方式以地铁等公共交通为主。INSEE的数据显示,只有36%的巴黎家庭拥有一辆汽车,而全国的汽车拥有率为80.1%。此外,只有13%的巴黎人驾驶汽车通勤,而在更为偏远的地区,这一数据为87%(布列塔尼)和86.3%(科西嘉岛)。^②显然,加征燃油税,造成中心和边缘的对立。当居住在巴黎的环保主义者向小岛上的工薪人士传递绿色出行的理念,“何不食肉糜”式的对话招致中下阶层的强烈不满。但不能一概而论认为中下阶层普遍缺乏环保理念,而是一种“不公平感”使他们厌恶燃油税:生态问题的主要制造者——跨国公司——并没有为此付费,柴油的消费大户——航空和轮船——甚至能享受免除燃油税涨价的优惠政策。相反,小城镇居民愈发难以感受从纳税中获得的回馈:在乡村,越来越多的医院被关闭,市政预算缩减,失业率高企。加征燃油税对生计的冲击无疑再次引发他们对税收的愤怒。可支配收入由此减少的中下阶层普遍生出自我怜悯,这也是“黄背心运动”的直接动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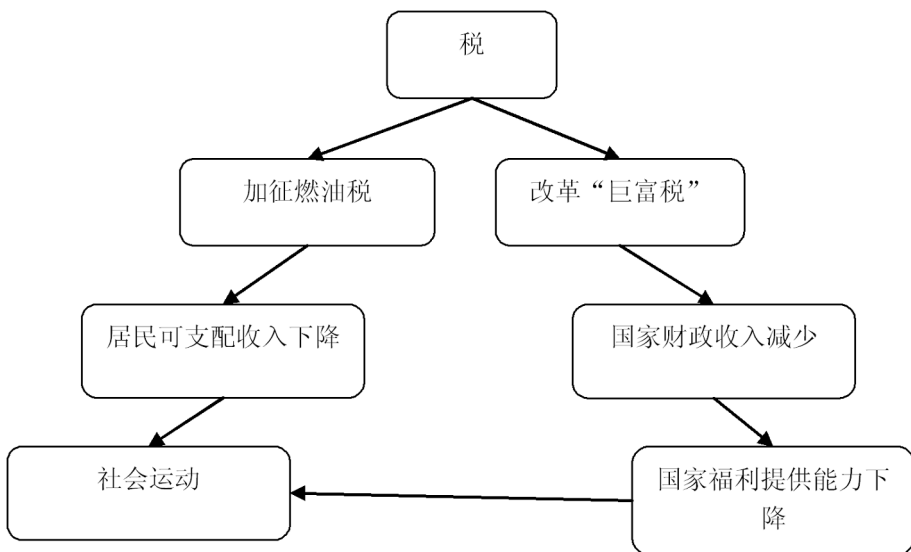
此次运动中一个关于政府减税(社会团结税)的法案同样遭遇大规模抗议。社会团结税又称“巨富税”(L'impôt de solidarité sur la fortune,简称“ISF”),是法国特色的

^① 汽油价格为2019年3月“SP95”价格,柴油为2019年3月价格, <https://www.automobile-club.org/tourisme-et-voyages/prix-des-carburants/europe-et-monde>, 2019年2月27日访问。

^② L.Bianchi, 《Chi sono i 'gilet gialli', la versione francese dei Forconi》, <https://www.vice.com/it/article/wj3n9b/chi-sono-gilet-gialli-movimento-protesta-francia>, last accessed on 10 February 2019.

税种,自1945年战后临时设立至今,政府间或开征。45万多户家庭资产超过130万欧元的“巨富”们每年可为国家带来50多亿欧元的财政收入。在“巨富税”的巨大杀伤力下,法国每年有700-800户巨富家庭放弃法国国籍,大量资本流失海外。^① 马克龙上任后推行“巨富税”改革,意图吸引更多投资和企业回流,从而缓解经济停滞、失业率高企等沉痾。法国前总统奥朗德称马克龙是“超级富豪们的总统”,向富人阶层收取的税费减少30%,而向工薪阶层收取的税费则增长45%。^② 在舆论带动下,马克龙被戴上精英总统的帽子。民众对马克龙“巨富税”改革的不满在于,这一改革将减少纳税户数量从而减少税收收入,从而导致国家福利提供能力的下降。事实上,马克龙并没有真正取消“巨富税”,而是将传统的“巨富税”改革为“房地产巨富税”,通过将能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本剔除出纳税科目,刺激经济增长并带动就业。“巨富税”改革的短期税收损失和长期带来的经济增长孰高孰低尚未可知,然而愤怒的法国人民并不愿给政府更多时间,在“黄背心运动”中抗议要求恢复开征“巨富税”。迫于压力,法国政府已表态在试行18个月后将重新评估是否继续施行改革后的“巨富税”。

图1 法国社会运动后的两种税收逻辑



注:表由作者自制。

^① 姚蒙:《法国“巨富税”为何动不得》, <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8-12/13781779.html?agt=15422>, 2019年2月14日访问。

^② 《Macron est le ‘président des très riches’, selon Hollande》, <https://www.europe1.fr/politique/macron-est-le-president-des-tres-riches-selon-hollande-3635753>, last accessed on 10 February 2019.

“中心”与“边缘”、“巴黎”与“外省”、“精英”与“大众”,任一组词都能挑动福利国家的敏感神经。“外省”人士认为,自己身处被边缘化的社会,未能充分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的福利却要为环保税埋单,而巴黎的跨国公司和精英们是燃油使用大户却鲜受燃油涨价影响;“精英”们恐惧高昂的雇用成本和福利体制,部分选择迁出法国,政府希望以减税吸引投资从而重振国家经济,却又引来公众愤怒的声讨。围绕税收的两项改革,虽然前者增税,后者减税,却同时撬动了福利水平和社会运动。福利国家日益陷入“双重困境”,无论增税或减税,由于普遍的福利能力下降,反映在社会结构上便产生“精英”和“大众”的福利对决。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本次“黄背心运动”是被税收撬动,那么民众真正表达的是对长期以来高税收体系的不满,而不简单是增加燃油税抑或取消“巨富税”。民众仍然广泛效忠于公共社会支持,但这种情感如今已掺杂对税收增加的坚决抵制。^①当个人税收达到最高点(法国是欧盟税收最高的国家之一)、政府福利承诺业已到达极限时,一味想要维持既有的福利水平,同时降低个人税率,这两种相悖的政策目标是无法并行的。法国的問題已不是靠简单削减福利开支可以解决。一场关于税收结构、福利结构调整的改革呼之欲出,但这通常会冒犯分配正义的原则。

(三) 马克龙系列改革:短期还是长期福利损失?

“黄背心运动”中后期,“黄背心们”表达的一个重要诉求是反对马克龙政府及其任上主导的系列改革。2017年以“黑马之姿”赢得法国大选的马克龙总统上任时即代表民众重建“新法国”的期待。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言,要“重建破碎而阴郁的法国,恢复昔日的辉煌”。上任以来马克龙政府主导的主要改革如下。

(1) 经济改革。马克龙的市场改革自由主义痕迹明显。整体而言,他希望法国摆脱对政府支出的依赖,营造更有活力和创业精神的市场环境。为促进投资和增加就业,马克龙主导一系列降税、减税计划:至2022年将企业税率由33%降低到25%;推动“巨富税”改革,不再对动产和金融投资资产征税(IFI);降低中小企业税率。^②这一系列改革给马克龙打上“亲商总统”的标签。

(2) 劳动力市场改革。法国失业率在欧洲名列前茅,特别是青年失业率高达23%,劳动力市场僵化、企业雇用成本过高是重要原因。马克龙在大选时承诺到2022年将失业率降至7%,为此他在当选后即启动劳动法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强化了雇主的权益,以此刺激雇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改革主要包括简化集体谈判程序、降低

^① [英] 保罗·皮尔逊编:《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汪淳波、苗正民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16页。

^② 2018年欧盟企业平均加权税率为21.3%,而法国企业税率为33.30%,在欧洲国家中排名第三,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european-union/corporate-tax-rate>, 2019年2月14日访问。

解雇成本和释放劳动力流动性等。这些改革触犯众多劳动者的利益,因此,自公布之日起就发生多起地方性抗议。^①

(3) 福利改革。马克龙福利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降低福利水平。他计划到 2022 年将公共支出从占 GDP 的 56% 以上(这比欧洲平均水平高出约 10%)降至 51.2%。^② 马克龙政府启动对社会保险、公务员制度和退休金制度的改革,包括将独立经营者逐步纳入普通社会保险制度、逐渐融合私人部门和公务员退休制度、用“全民退休制”合并 42 个养老金计划,裁减 12 万个公务员岗位,缩减 30-40 亿欧元失业保险支出,同时将失业保险发放对象扩大至所有劳动者和辞职职员。^③ 此外,月收入超过 2000 欧元的退休人员,普遍化社会捐金(CSG)提高至 8.3%。^④

(4) 提升法国国际形象。以上改革事实上都是马克龙力图提振经济、提升法国国际形象的举措,此处仅讨论马克龙增加燃油税的动机。美国于 2017 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或被马克龙视为法国生态转型、获得气候领域话语权、重塑法国全球大国形象的契机,他提出“让地球再次伟大”的口号。此次提高燃油税的重要动机是落实“巴黎协定”,促进节能减排。政府主导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十分必要,且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然而马克龙似乎选择让普通民众来为法国的国际形象付费,导致国家在全球治理责任和民众诉求间的平衡被打破。

应该说,马克龙对法国经济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后工业时代的法国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像“年迈的老人”,劳动力市场僵化、过高的企业税负使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不断出走法国,而投资的减少和企业的迁出又进一步加剧失业率的高企,尤其在经历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打击后,法国至今未能恢复。马克龙采取的企业减税、赋予企业更多雇佣灵活性和自主权的措施对于恢复市场活力很有针对性,其劳动力市场改革受到相邻德国“哈茨 IV”改革的感召,但举措更为温和。德国借此成功实现经济增长,并将失业率从最高时的 13% 降到 3.6%。从马克龙改革的效果来看,2017 年法国经济增长率翻倍,2018 年民众实际购买力增长 1.45%,2018 年失业率为 9.20%,这是自 2013 年

^① 2018 年 1 月,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PSA)表示将利用马克龙的劳动法改革实现 1300 名自愿裁员和 900 名提前退休计划,这引发了工人抗议。类似的裁员意向还出现在多个行业。

^② “French Malaise and Why Macron’s Reforms Matter”, <https://www.ft.com/content/2d312e90-c187-11e8-95b1-d36dfef1b89a>, last accessed on 10 February 2019.

^③ 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人群是马克龙政府为劳动力市场改革预计造成的短期失业、非自愿失业增加所采取的预防、缓冲措施,但并不违背其缩减失业保险开支的目标。

^④ 《Le recul de Macron sur la CSG des retraités coûtera 1,5 milliard d’euros》, <https://www.europe1.fr/politique/le-recul-de-macron-sur-la-csg-des-retraites-coutera-15-milliard-deuros-3819644>, last accessed on 10 February 2019.

以来失业率首次低于10%，2019年4月失业率已降至8.7%。^①法国政府预测，在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下，2022年失业率可降至5.9%。学者亚历山大·德莱格(Alexandre Delaigue)评价马克龙是布莱尔主义者，“其目的是吸引最富有的人，增加税收，最后再为穷人提供服务”。^②照此逻辑，马克龙是希望以民众的短期福利存量损失为代价，以期改善长期福利。然而，经济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政策属于长期政策，需要较长的政策周期来调整、实施和验证，这同样是公众最敏感的领域，而“失语”的马克龙未能传递其在长期改善福利存量的愿景，也没有形成改革的前提——广泛的社会共识，从而无法为强制性接受损失提供合法性。当代法国几代领导人都试图仿效英美自由主义之路，但皆因未能处理好民众的福利期望和社会运动热情而告终，这成为自由主义领导人的“历史宿命”。正如博诺里对法国改革经验的评述：“一个社会是否有形成激进改革的自由，不仅取决于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还取决于这一因素能否与一个具体社会结构的其他许多特色相结合。”^③社会运动传统深厚、政府与工会间缺乏信任的法国显然不具备福利制度激进改革的条件。

社会建构学派的理论认为，政策的选择是社会对于“社会问题”主观阐释和建构的结果，也取决于对“问题意识”的不同理解。政策方案的选择既取决于各智囊团在“政治市场”中的激烈角逐及对政治方案的兜售，也取决于执政主流团队自身对社会问题严重性和解决方案的主观认知。^④马克龙以大幅改革的纲领和中间派立场当选，在改革中也无须受传统左右派势力干扰。但当选前的银行业执业背景使其天然亲近自由主义，这影响了他在社会政策和劳动市场改革中的价值取向。从执政领导团队来看，马克龙本人是典型的“精英型领袖”，其幕僚也以技术官僚为主，因此政策制定的风格具有高度的技术理性，缺乏对弱势群体的现实关怀。如果国家理性的动机是为获取持久的福利提供动力，那么遗憾的是，由于未能妥善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果已相去甚远。迫切追求效率的马克龙在改革过程中未能坚持自己在当选时擅长的“兼顾”或者说“制衡”之法——中间派的取胜之策是当法国传统政党斗争胶着之时，传递

^① Eurostat, 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how.do?dataset=une_rt_m&lang=en, 2019年2月10日访问。马克龙为降低失业率采取的做法也受到一些质疑，如新增的就业合同中85%是临时性固定期限合同，其对长期就业率是否能改善尚不可知。

^② R. Phillipine, 《La preuve en chiffres que Macron est bien le president des riches》, <https://www.capital.fr/economie-politique/la-preuve-en-chiffres-que-macron-est-bien-le-president-des-riches-1299602>, last accessed on 13 March 2019.

^③ [英]朱利亚诺·博诺里：《政治制度、否决点和福利制度的适应过程》，载[英]保罗·皮尔逊编：《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第278页。

^④ 刘涛：《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社会政策的V型转弯和政治光谱的中性化》，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1期，第64-81页。

出当选后两派选民利益都至少不受损失的可能性,民众也因之抛开政见和党派,转而支持这匹政治“黑马”。从其当选后的一系列改革来看,马克龙高度重视市场效率,却忽略对社会正义的维护。“黄背心运动”中大众对马克龙政府的反抗也可以理解为大众对精英政治和精英治国的反抗。布迪厄曾在1995年反对朱佩改革的罢工中发表公开演讲,强烈抨击技术官僚和自由主义信奉者的盲目和局限,呼吁尊重个体的真实境况。^① 在后现代的法国,这种思潮仍然占据主流。

五 反建制主义视角下的新社会冲突与法国福利国家改革

法国“黄背心运动”与当前欧美社会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及反建制派的社会运动浪潮相互呼应,运用电子空间的便捷动员模式和组织模式,促使不同诉求的社会大众迅速被组织起来,网络大众及社会大众反对精英和建制派单方面确立的改革议程和改革方案。大众对精英的不满和不信任在“互联网+”时代迅速在网络空间传播,社会的负能量高度累积且迅速传播,并进一步转化为虚拟空间之外的实体空间的抗议行动,于是街头反建制派的社会运动与网络空间的反建制派的话语声势积累遥相呼应,构成了一幅网络时代社会冲突的新画卷。

互联网时代的新社会冲突及社会运动继承了法国的“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历史传统,同时也延续着法国历史上“大众与精英”两极对决的传统。民众对于精英单方面设置的改革议程及理性化发展目标颇感抗拒,通过实际的抗议行动对精英选定的改革路线图及改革方向进行了阻击。这样的反建制、反精英的社会氛围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团体的理性沟通、理性话语和理性决策越来越艰难。法国福利国家在这样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对决的逻辑中不断摇摆、进退失据,失去了稳定的发展方向。

风暴的中心点在于税收政策的改革及变迁,马克龙政府上调燃油税的改革措施看似合理而且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宏观目标,然而该项改革直接影响到中下层的生活状态和现存利益,看似合理的改革实际上损害了法国社会中最脆弱的、易受改革波及的中下层民众,影响了该阶层民众的福利存量。而法国政府推行的对工商业阶层的税收下调政策及部分税收豁免(例如取消“巨富税”)让普通民众感觉到改革的最终方向是新自由主义——也就是有利于社会精英阶层的改革,其提高了精英阶层的福利存量而降低了普通民众的福利存量。在民粹主义的社会整体心理环境中,这样的改革易被

^① Pierre Bourdieu avec les grévistes de 1995 : 《Contre la destruction d'une civilisation》, https://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18/03/22/pierre-bourdieu-avec-les-grevistes-de-1995-contre-la-destruction-d-une-civilisation_5274545_3232.html, last accessed on 27 June 2019.

解释为——社会逆向再分配,也就是一项改革总体有利于精英阶层,而改革的成本则反向由社会中下阶层来承担。于是,源自法国传统的关于社会不平等讨论在反建制时代转化为高烈度的两极化社会对抗。公众愤怒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及决定着社会运动的走向,而税收背后的福利存量拉锯战则是改革的主战场。

从福利国家改革的角度来看,法国“黄背心运动”的发展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冲突主义背景下迷茫福利国家的社会画卷。古典福利国家时期的社会冲突在法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和持续扩张时期尚能起到正面的社会作用,且兼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在1970年代之后风起云涌的新冲突时代,面对社会经济背景的重大变迁,社会经济结构及人口结构“恒久失衡”的状态已使法国福利国家体制的黄金时期不可再现。在社会经济结构日益固化、福利总量变化不大的状态下,激烈的社会冲突及分配冲突很难达到福利国家扩张时代的“抗议效果”。相反,剧烈的社会运动让法国锁定在福利体制难以撼动的局面,福利国家改革呈现“无向游弋”状态,失去准确方向的法国福利国家像一艘福利巨轮在社会运动的巨浪之中迷航。

保罗·皮尔逊认为,在福利紧缩时代,福利国家需要完成“再商品化”“控制成本”和“重新校准”三大改革,而法国的社会运动除了在阻击福利公共产品“再商品化”及遏制新自由主义方面有一定积极意义外,更多是妨碍了另两项目标的完成。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由于福利制度相对均质和普惠,因此在“控制成本”及“重新校准”方面的改革比较容易实施,改革也相对容易获得民众支持。同为法团主义模式的德国虽也面临与法国同样的难题,但推崇社会伙伴关系和国家理性主义的德国进行了坚决果断的改革,通过国家调控下的适度商品化及重新校准,成功实现福利制度的“软着陆”,在德国的改革中,政府冲破民众抗议而重构了福利国家的基本设置。唯有高烈度社会冲突的法国,福利制度的诸项改革都在高声量的社会抗议中一一搁浅。

可以预见的是,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社会博弈”,因为对于福利国家“续存”的一些重要改革目标将再次终止于社会的“裂解”式冲突中。当社会成员和群体不能像哈贝马斯所倡议的在“有效理性沟通”基础上进行合理协商时,社会改革停滞的最终成本将由整个社会来承担。深陷于新社会冲突中迷航的法式福利国家将再次无向漂流,无法锚定前行的方向。

(作者简介:刘涛,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德国杜伊斯堡及埃森大学教授;王滢淇,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杜伊斯堡及埃森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责任编辑:宋晓敏)